



當年父親從軍就是為了打倒外國帝國主義，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以便建立一個國父理想——統一的自由、平等、均富三民主義新中國，這是他一生信守不渝的最高目標。所以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得以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一躍成為世界四強之一，他也因為抗日有功而得到軍人最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可以說是一生軍旅生涯的最高峰。

父親自民國 30 年起才有寫日記的習慣，一直到民國 50 年為止，51 年 2 月他便因為心臟病去世。在這二十年間，他曾三度中斷日記——第一次是因戡亂戰爭失敗，他從陝西到四川到西康，孤軍轉戰千里，護衛政府遷蓉（成都）、遷臺，而於民國 39 年 3 月 26 日不得不自西昌離開大陸，從那一天起，直到 40 年底他到浙江外海貧瘠的大陳前線，領導反共救國軍重新立足之前，這二十一個月期間因為失去大陸，內心痛苦至極，而沒寫日記；其次在民國 42 年他自大陳奉命返臺入國防大學深造，到兩年後的民國 44 年再次負重任到澎湖擔任防衛司令官之前；第三次則是他在 45 年 4 月在澎湖任內奉命赴美訪問，到當年底共約八個月。

但他的日記對於歷史事實的印證，尤其是國軍奮鬥史的留傳，仍然有極大價值。由於父親寫日記的目的，照他自己所說是留下紀錄，以便「在生活、工作上作為檢討的資料」，所以有重點、有特色：

首先是日記的文字反映出他從心底對領

袖，也就是蔣中正先生的尊崇。他一生都注重執行領袖（日記中稱為委座或總統）的意旨，尤其是領袖的戰爭指導，所以對於蔣先生的公開及私下談話、訓詞以及態度，多忠實地加以記載，提到領袖時都空一格表示尊敬，也常根據他的訓示自我檢討並勉勵同仁。當然，蔣總統多年來對他的信任、愛護與提拔也可從字裡行間中看出，而他也曾不只一次的因為不同意蔣先生的想法及做法，而據理力爭。所以他的日記當然是國史館專家們編纂蔣中正先生有關書籍以及各界人士研究蔣先生與父親相關的國軍軍事史時，很好的參考資料。

第二個特色是日記中記載了與工作和戰事相關的極多的人名和地名，其中在抗戰和戡亂時期很多人、地都是與我國西北地區有關。這除了顯示當時他每日必須接觸聯繫軍方及各領域、各層面的人士，以及因所負責任的廣大地域而經常四處奔忙之外，許多內容也反映出我政府在那些年間，面對各種敵人以及各個不同地方勢力的問題之多，以及情況之複雜。

第三，日記顯示他一貫重視教育，總是花很多時間和精力為國家培養人才。他在不同時期的各個駐地都成立教育單位及訓練班，著名的包括抗戰時期的西安王曲第七分校、戰幹第四團、軍官訓練班、游擊幹部訓練班，以及後來在大陳設立的東南幹部學校等等，所教育訓練出來的軍事及政治人才總在十萬以上。我國西北地區人才極

缺，而且在戰爭年代，全國各地的部隊傷亡很大，一方面需要經常補充新血，尤其是初級幹部，一方面中央常把華北地區作戰失利的部隊送請父親整訓，所以教育訓練便成為父親極重要的工作，也是當時他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日記顯示，父親主持各個教育訓練單位，除了不斷設法改善學員的生活環境和教學品質外，特別注重武德的培養和精神教育，自己經常對學員講話，多半是提醒他們要作愛國愛民的模範軍人，所謂「無名為大，無我為大」，要用良心血性在艱困的環境中學習，結業後要同心同德的以國父理想為奮鬥目標，服從蔣中正先生領導，貢獻我們多難的國家。事實上，他所辛勤教育出來的各類人才，也確實在抗戰、戡亂以及後來建設臺灣時，做出了許許多多實際的貢獻。

第四，他一生幾乎都在戰陣中，所以作戰會報極為頻繁，軍情緊急時一天不只一次會報，而且經常在夜間舉行；但顯然是為了保密，會報的目的和他的動機並非都寫在當天的日記中，常常事後才見到執行了前次作戰會報結論的相關戰況發展。在戰事順利時，他從未用矜誇的文字敘述；而對於不利的戰況，日記也從不隱瞞。

第五，他經常詳細記載師長、朋友、訪客或袍澤有價值的談話內容，當天如果沒有記下來，則會補記；這顯示他十分重視溝通、交換意見，並珍惜他人的智慧。令人驚訝的是，談話內容中對於當時軍中問題的針砭或對他本人的責備諍言，他都誠實的

照錄，毫不客氣，毫無掩飾。這自然反映了他表裏如一的人格特質，和認真聽取各方意見的誠懇態度，而那許多坦白深入的談話建議，不但是研究抗戰及國共戰史的重要材料，就是許多有關做人做事練兵帶兵的原則和方法，現在讀來都很有參考價值。

第六，日記反映他對外國的軍事顧問一向相當尊重友好，以致不論是抗戰時期的蘇聯顧問，或是大陳時代美國政府成立的西方公司代表，以及擔任澎湖防衛司令官時期的美軍顧問，都與他維持很好的關係，有些外國友人甚至還對他講心裡話。他也因工作需要和有心進修，對於學習英文（包括後來在臺灣看外國影片）總有記載。

第七，日記中充滿了他對朋友、同事照顧的心意和行動，例如民國 37 年對自己的新年期許中，就強調要在當時的困難環境中「極力為同學、部屬、朋友謀出路」。在大陸時期的日記中，他固然經常記載對黃埔友人、同仁的父母長輩，或陣亡袍澤的遺眷子女的關切照料，到了臺灣後，儘管自己家人生活也不容易（例如我幼年時有時生病卻連買特效藥都困難），還對困頓的舊日袍澤友人儘量伸出援手，幾乎是有求必應；在澎湖服務時甚至每月主動取出自己薪俸的三分之一，支助同仁（但他日記中居然未提此事）。後來他在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畢業，被選為同學會會長後，還是一樣熱心地對同學校友提供服務，無怪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國防研究院同學們為了紀念他，不再選會長；

而他的朋友、部屬和學生們每年集會懷念他，到如今竟已歷時五十多年之久，卻從未間斷。這是多麼的難得！

第八，日記顯示他在結婚後雖和母親十分恩愛，卻從未讓母親住在駐地，反而因戰事和公務的羈絆，而常公而忘私，疏於照料遠在南京或臺北的母親。此外，父親除了自澎湖任滿返臺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直到去世前的短短兩年多期間，因為能與家人相聚而常記載親人情形外，他對私人的生活瑣事記得並不多；只有一項特別的發展，便是從民國 40 年代起，他逐漸接受基督教信仰，在澎湖駐防之際常去海邊祈禱，還勸人信主，也在逝世前一兩年參加過教會禮拜。

大陸淪陷最後一刻，父親其實是準備為國家獻出自己生命的。他在民國 39 年 3 月下旬離開大陸的前一晚，本來是決定把日記交給秘書長趙龍文先生帶到臺灣來，自己留在西昌，戰死在這個大陸最後的據點；但由

於蔣中正總統派專機來接，部屬們又聯合苦勸他保留一身以號召散失在大陸各地成千上萬的袍澤、學生，尤其參謀長羅列將軍自願效法漢朝時代救漢高祖的紀信而決心留在西昌率殘部拚死，父親才勉強同意來臺，這日記也才由他自己帶來臺灣。

今年父親的日記能夠由國史館公諸於世，對於還原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內外的複雜環境中艱苦奮鬥、領導抗戰的史實，以及彰顯國軍為了國家的統一及生存發展，多年來所作的無數犧牲，必有貢獻。盼望各地的有心人多加參考、多加利用，讓父親幾十年前費心所寫的親身經歷，能成為我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證，並且幫助所有炎黃子孫以及他們海內外的後代，更能了解當年的歷史真相。我也願藉此代表所有的家人向國史館呂芳上館長、何智霖處長，以及蔡盛琦女士、陳世局先生等參與本日記出版而辛苦努力多時的專家們，表達我們衷誠的敬意與謝意。